

屈原综论

易重廉 著



岳麓書社

易重廉 著

屈原综论

月玉书



岳麓書社

· 长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原综论/易重廉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2. 9

ISBN 978-7-80761-923-9

I. ①屈... II. ①易... III. ①楚辞研究—文集
IV. ①I207. 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4298 号

QU YUAN ZONG LUN

屈原综论

作 者:易重廉

责任编辑:曾德明 陶嶒玲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 yueluhistory. com

岳麓书社淘宝网: http://ylbooks. taobao. com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90 千字

印数:1—2,000

ISBN 978-7-80761-923-9/I · 1042

定价:28.00 元

承印:长沙市宏发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及其继承和影响（代序）

张玉玲

本文所涉及的“楚辞”，单指古今学者基本公认为屈原的作品，包括《离骚》、《九歌》、《天问》和《九章》。而对作者有异议的作品，如《招魂》，王逸题为宋玉；《大招》，王氏题为屈原或言景差；《卜居》、《渔父》，清崔述疑为伪托；《远游》，崔述、廖平、胡适等人谓秦汉人作，均作存疑，不加论列。至于东汉王逸编次《楚辞章句》所收集的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连同他自己的《九思》，都是“拟楚辞”，是屈原“楚辞”影响下的产物。与其说屈原的“楚辞”，不如索性按照戴震所说称屈原“赋”。或者直截了当说，屈原的作品，屈原的诗歌。

—

屈原在中外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人以文传，他的作品历代评价很高。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

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太史公不但称扬其文，而且赞誉其人，文如其人，予以“双优”评价。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章句第一》中说：“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闵其志焉。”亦人、文并扬。王逸并尊之为“经”，把《离骚》列入最高层次，盖“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宗经》）。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缛毫。”《离骚》之所以成为洋溢着艺术之美的杰作，归之于作者有奔放的才气、凌云的壮志和壮阔的思想感情。又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诗》《骚》并举，指明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两个高峰。

李白《江上吟》歌颂道：“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既高度评价了屈原的诗歌，同时又指出了精神文明产品的永恒性。特别是把“辞”、“赋”与“骚”相提并论，使我们对这三种文体的同一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近代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及其最佳成果。

以上聊举数例，足以说明“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其所以如此，实因为它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

二

在继承方面：

屈原在继承文化及文学遗产方面是多元的，可以说席丰履厚，得天独厚。

“楚辞”的形成，首先接受了先秦巫风文化。巫文化是楚地的民风、民习、宗教、迷信、舞蹈、音乐、图画、雕塑、器皿、服饰、饮食、起居、婚丧、建筑、礼仪等的集中反映。

根据古籍记载来看楚国的习俗，主要表现为巫风盛行。《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王逸《九歌章句·序》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不仅楚国如此，就是楚民族所建立的吴、越、陈等国也有巫风盛行的习俗。《汉书·地理志》记述陈国的俗尚是：“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巫鬼。”《诗经·陈风》的《宛丘》、《东门之枌》反映了陈国巫风的盛行。

甚至当时地名也有常用“巫”字的。如传为袁康撰的《越绝书》记载吴国的地名，有：“巫门外冢者，阖庐冰室也。”“巫櫪城者，阖庐所置……”记载越国的地名，以“巫”名者，有：“巫里，勾践所徙巫为一里。”“巫山者，越蝙蝠（巫官）死葬其上。”

由此可见当时楚民族巫风之盛了。伪《商书·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说明巫风的内容，为歌与舞。这种巫风，对“楚辞”的形成起着极大的催化作用，开拓了“楚辞”的园地。《九歌》是沅湘之间巫官文化的结晶，自不必说了；而《离骚》的情调和内容，也闪耀着巫官文化的情影，自“女嬃（须）之婵媛兮”以下，简直可以说是巫歌巫舞了。“女嬃”，楚

国女巫的一种名称。《汉书·武五子传》：“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颜师古注：“女须者，巫之名也。”由此可见巫风文化对屈原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了。

闻一多写了一篇《从人首蛇身像谈龙与图腾》的文章，论述他在湘西采风时，观赏了当地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以及苗寨土地庙的人首蛇身石雕神像，结合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印证了“楚辞”中的一些神话传说来龙去脉的演化过程。湘西一带是巫风文化盛行的地方。

根据出土的楚国文物“铜鼓”上的图纹如太阳纹进行考察，便可发觉与屈原《九歌·东君》的内容以及在《九歌》中描写的节日盛况有颇多类似之处。“铜鼓”是巫歌巫舞的道具。

荆楚白族的本主庙中的许多神祇，与《九歌》中的东君、云中君、大司命等多所吻合。庙是巫觐降神作法的活动场地。

文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工程，不仅有其相互吸收、融合的性质，也有其分化、传播的特点。因此，盛行于楚国的巫风，一方面必定辐射到四面八方，扩大范围；另一方面也必然从四方八面吸取养料，丰富内涵。从而构成灿烂的“巫风文化”，全面而深刻地促进“楚辞”的形成，并使其具备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明丽的传奇色彩的独特的艺术之美。

“楚辞”的形成又受到民间文学的启迪和影响。先秦民间文学主要包括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

首先是古代神话传说对“楚辞”的启迪和影响。“楚辞”丰富的奇异内容中诡异的神话和瑰丽的传说占了十分显著的位置。

我国著名的古代神话传说人物，如盘弧（盘古）、女娲、神农、赤松、黄帝、祝融（重黎）、颛顼、帝喾、羿、尧、寒浞、精卫、尧、舜、鲧、禹、娥皇、女英、后稷等故事，广泛流传到楚地的江汉和沅湘流域。屈原收做题材，进行创造性的描述，闪烁着震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天问》可说是一篇神话传说总录，除吸收了许多历史的神话之外，还吸收了许多历史化了的传说。包括奇异动植物传说，奇异变形成仙传说，奇异诞生传说以及帝位继承、帝室权变或战争传说（见乌丙安《楚文化摇篮中的古传说群》）。神话传说是一定的社会形态的产物，反过来又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形态和历史现实。神话传说是珍贵的文学遗产，其意义在此。

《离骚》也吸收了许多神话传说，自“女嬃之婵媛兮”以下，其中的一些地名、神名、动植物名，都以西陲的昆仑山为中心而自成一个系统，构成昆仑山系神话。提到日神羲和、月神望舒、风神飞廉、雨神（一说雷神）丰隆、雷神雷师以及西皇（王注即西王母）、宓妃、有娥佚女等都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或名媛，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经过屈原再创的《九歌》里的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也无非是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九歌》意象之美，模糊性与游移性之强，似在《离骚》之上，这与每篇（《国殇》、《礼魂》除外）写一个独立的神话传说有关。而《国殇》后段所写的情景与“刑天断首”神话也有某些类似。

这些超现实的神话传说题材，固然早已广泛流传，但经屈原一渲染推演，便更有具体的内容，强大的青春力量，也更换发着诗人天才的光辉，燃烧着他希望和理想的烈火，洋溢着他人格的芬芳。这些光辉夺目的神话传说，是以现实做基调的，《诗经》里不可多见的，显示了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又渗透又区别的各自特点。屈原作品的神话化、传说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发展，是浪漫主义发展到高峰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屈原笔下提炼出来的一系列神话传说，简直可与古希腊的美丽神话传说遥相匹敌了。

其次，古代歌谣对“楚辞”的重大影响。“楚辞”吸收了古代歌谣的菁华。在屈原之前，早已有大量的古代歌谣流传着，现

在保存下来的逸诗散见在古籍中的还不少，如《康衢谣》（见《列子》）、《击壤歌》（见《帝王世纪》）、《卿云歌》（见《尚书》）、《南风歌》（见《孔子家语》）、《麦秀歌》（见《史记·殷本纪》）、《采薇歌》（见《史记·周本纪》）、《子文歌》（见《说苑·正谏》）、《越人歌》（见《说苑·善说》）、《徐人歌》（见《新序·节士》）、《接舆歌》（见《论语·微子》）、《孺子歌》（见《孟子·离娄》）等，约产生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五世纪之间。前九世纪至前五世纪，即早期的楚民族文学，包括蔡、苏、江、黄、邓、若、邾、吴、徐、许、陈、越、莒等的楚民间文学；即便从冯惟讷《古诗纪》以及郭沫若的《金文大系》诸书中统计，为数也不少。《诗经》的十五国“风”，绝大多数也是保存下来的古代歌谣，约产生于前十一世纪至前六世纪之间。不论这些民间歌谣产地在哪里，但文化（学）的渗透和交流是不以封疆为界的，这些古代诗歌，或四言，或杂言，或有韵，或无韵，或嵌“兮”字，或不嵌“兮”字，百花齐放，篇幅多不长。但对屈原的诗歌创作有着极大的诱发作用，特别是那些嵌入舒缓语气拉长音节的助词“兮”字的歌谣影响更大，至于流行沅湘之间的祭神巫歌则直接是现行《九歌》的素材，屈原的《九歌》就是在“其词鄙陋”的“歌舞之乐”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优秀成果。

屈原在广泛学习民歌民谣的前提下，进行了诗体的革新，突破了四言句式，扩大了篇幅。除《天问》、《橘颂》还多少遵守着四言的格律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有意识地挥洒自如地运用了其他各体，或五言，或六言，或七言，或长短句，随感情发展需要而定。《离骚》和《九歌》中的《山鬼》、《国殇》，以及《九章》中的《惜诵》、《惜往日》、《抽思》、《哀郢》、《涉江》、《怀沙》等篇，如把句中“兮”字删去，便成为六言诗。《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河伯》等文，如把“兮”字删去，便成为五言古。其他诸篇，多用长短句构成，诗句的变化几

乎被屈原尝试殆尽了。这是诗人在诗韵句法上的革新，影响后代诗歌的发展极为深远。至于诗的篇幅之扩展，如 2490 字（据俞樾《评点楚辞》引陈深的统计）的自传性抒情诗《离骚》，1581 字（根据王逸评注楚辞章句本计算）说理兼描写的《天问》，已是空前的巨作。与其篇幅相匹者，也许只有荀卿的《成相辞》，汉末经过文人润色的民歌《孔雀东南飞》，唐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清吴伟业的《圆圆曲》以及近代诗人姚燮的《双鸩篇》几篇吧。屈原在诗歌革新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绩，都离不开古代歌谣的重大启示和影响。屈原的诗歌创作是在继承文学遗产上进行的。

屈原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也有所继承，常用到古代民歌的赋、比、兴。这又是民歌对屈原创作的启发和影响。《离骚经章句序》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离骚》如是，其他各篇也多袭用比兴手段，《橘颂》就是一篇突出的比兴体寓言诗。因而造成了诗歌的朦胧美与深邃美，令人味之无穷。赋、比、兴，是中国诗歌创作理论系统中的一个方面，源远流长，长盛不衰。

在篇章结构方面，有人研究《天问》的问答形式，与贵州彝文经典《宇宙人文论》相似，二者的内容也都在探索宇宙的产生，人类的起源以及天体万物的形成和发展，基本相同。这证明了《天问》与古代民间文学的承传关系。

屈原在深入广泛学习中国古代民间歌谣的基础上，大量吸收楚地方言入诗，以增强作品的通俗性和地方情调色彩，也是一种成功的继承和创新。

楚辞中使用的方言——当时的口语，可资查考而经一些学者认可的，其最著者，有用得非常广泛灵活而冗余音节的“兮”

字，是人人所知道的“楚歌”的特征。“骚体”主要是以“兮”字为标志，突出“作楚声”的特色。它增加了语言的弹性与音乐性，也增加了模糊与游移性，使人听来铿锵悦耳，看来意境幽深含蓄蕴藉，提高了艺术性的感染力。孔广森的《诗声类》中根据《尚书·秦誓》的“断断猗”和《大学》引作的“断断兮”，证明“兮”、“猗”音义相同，“猗”古读“阿”，则“兮”亦当读“阿”。《诗经魏风·伐檀》：“兮”“猗”为韵，古音都读“阿”，是当时人拿来表示惊叹语气的口语。还有用来表示疑问和惊叹语气的“也”字，在《九章·惜诵》中用得较多，与“兮”为韵，“兮”古读“阿”，则“也”（案：今湖南有些地方“也”犹念“yǎ”）用于音乐，也当读“阿”。“兮”、“也”二字都是当时的口语。“兮”字的使用，在屈原以前的许多作品中都不乏先例，但屈原用得最多，又很巧妙传神，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屈原所使用的楚地方言，为古今一批学者考证而足以取信的还有：诮、蹇（蹇）、扈、余、汨、莽、凭（冯）、闾阖、纷、修、纽、拏、齋怒、芰荷、婵媛（婵媛）、蹇修、颇、灵氛、灵、悼、娃、搏、棘、离骚等。以方言“离骚”命题，可称创例。

非楚语而亦方言者，还有“超”（《方言》：“钊、超，远也；燕之北郊曰钊，东齐曰超。”），如《九歌·国殇》“平原忽兮路超远”等等。屈原诗歌创作之所以成为革新的诗歌和通俗的文学，大量地采用民间口语，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楚辞”是屈原以其横溢的才华，接受众彩纷呈的先秦巫风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哺育，运用积极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通过个人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形象深刻地表现了自己并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面貌，才取得了如此震古烁今的最高艺术成就。“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屈原在诗歌创作上的光辉成就在于多方面深层次继承古代文化（学）的遗产。

三

在影响方面：

“楚辞”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是极其广泛深刻的。

第一，神怪小说之祖。

中国古代断片的神话传说固然散见于《庄》、《列》、《左》、《韩》、《山海经》、《穆天子传》诸书，保存下来，但求神话为小说的前导者，须先推《离骚》、《天问》、《九歌》等作。

《山海经》是有名的古代神话辑录，自古视为奇书，传为大禹、伯益所记，不可信；大约是秦汉之际方士的札记，亦非一时一人之笔。朱熹《记〈山海经〉》中写道：“予尝读《山海》诸篇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皆为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图画而为之，非实记载此处有此物也。古人有图画之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如此看来，《山海经》有受楚辞影响。不但《山海经》如此，就是后来许多神怪小说如东方朔的《神异经》、《海内十洲记》以及魏晋以降的怪诞离奇之笔，如干宝的《搜神记》、荀氏的《灵鬼志》、王浮的《神异记》，乃至神魔小说《西游记》等，其中虽或渗入了一些自佛教传入中土以后的沙门故事，但近汲《山海经》而远取“楚辞”这一点，也不容抹杀。

第二，汉赋之祖。

由于“楚音”婉转流丽的缘故，所以汉代帝王每喜楚声。《汉书·礼乐志》：“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故《郊庙歌辞》（《乐府诗集》卷八）的《安世房中歌》为楚声。汉武帝好楚声，而不喜河间献王所献的雅乐。汉乐府《相和歌》中有楚调，可见南音悦耳颇受欢迎。《汉书·王褒传》载宣帝刘询征能为楚辞的九江被公。君主倡之于上，群臣宗之于下。因而“楚辞”在

汉代的力量有如风靡，“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文心雕龙·辨骚》），实肇汉赋之端。就篇章结构上说，赋尚铺张虚饰，如篇首托为问答或故事，中缀韵语，末加“乱曰”，从“楚辞”脱胎而来。就表现方法说，汉赋以讽谏为本，亦源于“楚辞”。《离骚》“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隕，规讽之旨也”（《辨骚》）。“楚辞”早用了讽谏的表现手法。至于汉赋气象山河，体貌宫殿，上下四方，纤细毕举，壮辞设譬，曲为形容，显然是受到“楚辞”描写、夸饰等手法的影响。再就用字方面说，“楚辞”中多用双声叠韵连绵字和重言，如：纯粹、耿介、逍遥、相羊、郁邑、周流、追逐、婵媛、陆离、岌岌、申申、浪浪等等，充满篇幅，的确可以加强音调的谐和与悲壮。汉代赋家如司马长卿等皆相继沿袭，若《长门赋》、《子虚赋》、《上林赋》，或用重言，或用双声，或用叠韵，或一句双声、一句叠韵，交错间杂，铿锵有声，韵律美妙，竟成辞赋中重要的特征。

汉扬雄以屈原的作品具有“诗人之赋丽以则”的本色，与“丽以淫”的“辞人之赋”不同，所以或叫“骚赋”。所指“辞人之赋”，就是汉赋（大赋）。《文心雕龙》有《辨骚》、《明诗》、《诠赋》三篇，三者固分，实一脉相承。《汉志》说：“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惻隐古诗之义。”《辨骚》中也说：“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即此一端，可以说“骚赋”是“诗三百”和汉赋之间的桥梁。

骚赋“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辨骚》）。已具铺张扬厉、渲染色彩的手法，亦开赋家之先声。

刘勰在《诠赋》中写道：“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章实斋在《校讎通义》里指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由此可知“诗”“骚”“赋”三

者的关系。故曰“楚辞”是汉赋之祖。

第三，乐府之祖。

“乐府”之名虽起于西汉，但就乐府文学的性质和含义而论，上自《诗经》、“楚辞”，中经汉魏六朝古风，下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乃至花部乱弹，凡可以入乐的韵文，其实皆属广义的“乐府”。唐宋人的诗词集往往缀以“乐章”或“乐府”之名，就足以证明“乐府”的广义范围了。

考汉代乐府的郊庙歌辞，不外乎“诗经式”与“楚辞式”两种句型，前者以四言为基本句型，且不必去说它。“楚辞式”的都是三言句式，只是去了“楚辞”七言句中的衬字“兮”。如《汉郊祀歌》的《练时日》中描写神灵下降的情景：“……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苍龙，右白虎。灵之来，神哉（应作威）沛，先以雨，般裔裔。灵之至，庆阴阴。……”若在两个三言句中间加个“兮”字，不但形式与“楚辞”相似，连神情也酷肖。《安世房中歌》这类郊庙歌，也有“诗经式”和“楚辞式”两种句法。后者的句式，全与上例同。如：“安其所，乐终产。乐终产，世继绪。飞龙秋，游上天。高贤愉，乐民人。”若在两句之间用“兮”字连起来并成一句，亦类似“楚辞”。再如《汉书》卷五十三录广川惠王的一首歌：“愁莫愁，居无聊。心重结，意不舒。内弗郁，忧哀积。上不见天，生何益？”若在两个三言句之间缀上“兮”字，又何尝不像“楚辞”。

总之，这些贵族老爷所作的三言句式的乐府诗，都是脱胎于“楚辞”的。这是因为汉自高祖刘邦以来，君臣上下都喜好“楚声”的原故。“楚声”包括“楚辞”在内，是古代文学中的“南派”，与“北音”不同，文字的声色很婉丽，想象力丰富，神话意味浓重，影响后代文学很大。

第四，游仙文学之祖。

魏晋间的游仙文学的思想，也是祖述庄子与屈原的泛神思想

而兴的。在当时的诗歌中，泛神思想的精神，随处可以看出，而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诗文产生了不少，造成一个美丽缥缈的世界。由于这种象征的暗示性，引导读者入于离奇的幻想与超现实的境界，完成艺术上的净化作用。陆机的《前缓声歌》，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读山海经》，乃至阮籍的《咏怀诗》和左思的《咏史诗》等等，都多少受到《离骚》、《天问》、《九歌》等篇的暗示。这种游仙文学所反映的高蹈精神，在中古成了解脱时代苦闷的寄托。降而至于唐代，诗人也往往在作品里夹杂些神话传说，增加作品的容量以及暗示性和游离性。显而易见的，如诗仙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幽怪诗人李贺的《苏小小墓》中的“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不就是《离骚》中的望舒为前驱，鸾皇为先戒，以及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么？李商隐的《嫦娥》，不就是《离骚》中的宓妃，有娥佚女之流的神话人物么？这类例子，在历代诗歌的园地里是很多的，不胜枚举，使读者多一份丰富的艺术欣赏。

第五，剧诗之祖。

剧诗可以包括在灵感歌类之中，是以文字和动作表现思想感情的。剧诗来源很早，远源当推太古的祭祀歌。古代祭神必佐以歌舞，而歌舞必由巫来表演。郑玄《诗笺》里指出这点：“是古代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者也。”巫以歌舞娱神的风气，实开剧诗的先河，不为过分之论。经屈原改写的《九歌》，其底本就是由巫用来祀神娱神的，是春秋战国时代湘沅之间民众的灵感歌辞，也可以说是“剧诗”。《离骚》、《天问》等也都是“剧诗”（歌曲）的滥觞。古代人民在祀神时，都要通过巫来载歌载舞。《离骚》通篇采取自述并夹些自问自答，交织着丰富多彩故事情节，有较浓厚的自述代戏曲的味道，说它是南方戏曲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未尝不可。

剧诗的遗风很盛，源远流长。后世如宋元的杂剧，明清的戏曲，以及后来的花部乱弹，也都可以说是剧诗。“楚辞”影响于“剧诗”的地方极大。

第六，五、七言古诗之祖。

成篇的五言、七言古诗，虽起于汉代，但远求其源，在《诗经》中已有单句的五言和七言，而在《楚辞》中除了单句的五言和七言之外，有几乎成篇嵌“兮”字的七言古风。如《山鬼》、《国殇》，《九歌》中的一部分如《河伯》、《湘君》等，把“兮”字删去，基本上便是五言古风。楚汉之际，一时盛歌“楚声”，产生了为数不少的优秀七言歌辞，如《垓下歌》、《大风歌》。及汉统一天下，定礼乐，其文学并用北方的古诗体和南方的“楚辞”体，于是逐渐创造出整篇的五七言古诗。

第七，骈俪文学之祖。

骈俪文的特点就是“辞多偶俪，义不单行”，兴于汉，而盛行于魏晋以后。但探其远源，“楚辞”亦已开骈俪文的先河。《九歌》里的许多句子如：“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湘君》）；“令飘风兮先驱，使涷雨兮洒尘”（《大司命》）。这些偶句都是《文心》中所谓“精巧”的“言对”。《离骚》里的“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这便是《丽辞》所说的“事对”或“正对”。“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东皇太一》）；这便是洪迈《容斋随笔》中所说的“当句对”。诸如此类的绝好的丽辞，不胜枚举。后来骈文家苦心摹仿，也难企及其清华朗润呢。如果研究骈俪文的发展史而忽略这一点，那就是数典忘祖了。

除此以外，历代具体作家及其具体作品受“楚辞”的深刻影响而取其一体，最显著而可提及的，有宋玉的《高唐》、《神女》、

《登徒子好色》诸赋，曹植的《洛神赋》，以及凡是后世以描写爱情为主题而寄托讽喻的抒情小赋，与其说受了《国风》的影响，毋宁说受了“楚辞”的影响。唐代孟东野、李长吉二人的诗有多写其孤愤之情的，受《离骚》的影响也很大。孟东野的《独愁》诗中有“常恐百虫鸣”之句所反映的思想感情，就是与《离骚》中的“恐鸱鸒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如出一辙。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曾说：“李长吉诗出于《离骚》”；而杜牧《长吉集序》中亦说：“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其他作家，不及遍举。

四

总之，屈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楚辞》是一部伟大辉煌的著作。其内容如春园群芳，鲜丽的葩，各自争妍。其韵调如钧天广乐，一节一拍，皆圆润可喜。其句法如游龙戏水，极波澜壮阔之妙，其摹写景物，莫不细腻精致，曲尽形容，使人瞻言而见状，即字而知时。其衣被词人，已非一代。班固说：“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离骚〉序》）由此可见屈原创作的影响后世文学发展之大之深。《楚辞》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作者善于继承、富于创新。《楚辞》在文学史上取得如此崇高地位的原因就在于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桥梁作用、纽带作用。

《离骚》以屈原而成篇，屈原以《离骚》而见志。中华民族以有这样伟大的诗人并写出这样伟大的作品如《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篇什而感到自豪，民族自尊心油然而生。精神文明建设是培养“国魂”，振兴民族的重要手段和渠道，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点！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